

消费与启蒙：电影传入中国之初的广告语境分析 (1897—1907)

张隽隽

摘要：1897年，电影第一次在上海放映。第一个10年间的电影广告，对电影的宣传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助游赏、广闻见和开民智。这些宣传语不仅和电影本身的性质有关，也和晚清的文化语境有着密切关系。传统文人的“玩物”心态、修身功夫和教化观念，与清末来自欧美和日本的时尚追求、知识观念和启蒙理想结合起来，造成了这些诉求极为复杂的广告修辞。而广告中所显示的对电影的独特理解，也预示了日后中国本土电影产业的发展道路。

关键词：电影传入之初；电影广告语；助游赏；广闻见；开民智

作者简介：张隽隽，女，讲师，艺术学博士。（浙江传媒学院 文化创意学院，浙江 杭州，310018）

中图分类号：J943.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552 (2017) 04-0090-05

1897年，电影首次出现在上海。^①之后的大约十年间，电影一直以临时性、流动性的放映方式，不定时地出现在上海的各类场所，^②被各个社会阶层广泛接受。和在其他国家一样，最新摄影和投射技术所创造的活动影像所带来的新奇感和震惊感是1897—1907年之间电影最具吸引力的特质。但如果仅仅具备新奇性，电影应该只能流行一时，因为恐怕没有哪种文化娱乐产品的娱乐性能够长期建立在单纯的感官刺激之上。因此在新奇性之外，此时的广告还就电影的意义和功能进行了宣传，吸引观众多次、重复观影。

10年间，出现在中文报纸上的电影广告不在少数，本文认为，这些广告宣传语大体上来说都可以归结到正文三个方面。这样的三个功能不仅得自于早期电影的某些特质，也与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自我认知、世界观念、社会文化转型联系在一起。

一、助游赏：“玩物”心态与时尚追求

观看电影是一种公共性的娱乐活动，早期的电影广告会强调集体参与的愉悦。例如，同庆茶园预告电影的时候称，“以东粤之笙歌，兼西瀛之机巧，宜乎簪裾纷集车马喧阗也。”^[1]同时，电影放映还会与其他娱乐项目同时并置。1900年11月期间，徐园举行菊花会，“晚间有英法美三国活动影戏奇巧戏法空谷传声以助雅兴。”^[2]荣春茶园夸耀即将放映的电影“诚洋洋乎大观也！至于秦西之土俗民风，与夫一切插科打诨，尤足移情悦性，遣此良宵”。^[3]这样的方式，将陌生的电影与当时人们相对熟悉的其他娱乐方式混杂呈现，当做聚会交游的助兴项目，降低了电影的接受门槛，也赋予了电影特殊的意义。正如荣春茶园在广告中所说的，“客有好奇者乎？尚其蜡屐同携，效宗少文之卧游也可。”^[3]宗少文是南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6年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民国时期教育电影传播与接受研究”（16YC026）的阶段性成果。

① 按照中国电影史通行的说法，1896年8月11日，徐园“又一村”的放映活动，为电影传入上海之始。但是这一说法缺乏坚实的证据。近年来，黄德泉的《电影初到上海考》（《电影艺术》2007年第3期）、杨击的《电影初到上海再考》（《新闻大学》2014年第4期）等文章指出，1897年5月22日礼查饭店的电影放映才是电影传入上海之始。当时的中英文报纸上详细介绍了放映商姓名、放映片目、现场情况等，应该说是有着较为可谓可信的。

② 笔者考证，当时的茶园、茶楼、西式剧场、照相馆甚至包括宗教会所等都曾在《申报》《游戏报》等大小报纸上打出过放映广告，可见只要是人群聚集的娱乐场所，都有可能观看到电影。

朝宋画家，一生游历过许多名山大川，晚年将游历过的山水绘在室中观看，自称“卧游”。这一运用了古代典故的广告，将看电影这一西来的娱乐方式，与传统文人的生活习惯、精神世界联系了起来。

中国古代的文人有着雅集的传统，往往会在某些特定的日子里，流连于自然山水之间，并伴有行令听曲、诗词唱和、挥毫作画等辅助性的活动。这样的集会，常常成为文史佳话，被后世的文人仿效。曹丕在《与吴质书》中回忆早年与朋友聚会时候的盛况：“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连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4]东晋永和九年，名士王羲之、孙绰、谢安等41人“修禊日”宴集，便因不朽的书法作品《兰亭集序》而被人铭记至今。在这样的集会上痛饮美酒、挥毫泼墨，也成为“名士风流”的象征。到了明清之际，文人更是通过对书画珍玩、花鸟奇石等脱离了实际日用的“长物”（玩物）的沉溺和迷恋态度，营造一个“没有时间意义的游戏世界”，^[5]在人与物相互交融、相互渗透的过程中，展现有别于科举仕途的人生价值和美学情境。对于中国古代文人来说，无论是自然风光还是古物珍玩，与物的相互交融、相互渗透，能够让人达到一种物我合一的超脱境界，得到精神上的净化。尤其是在政治不修或仕途受阻的时候，寄情山水、纵情诗酒、品茗焚香都是逃避现实、充实自我的方式，有此举的文人甚至能够获得“清流”的美誉。此外，这样的聚会活动也有着相同志趣的知识分子切磋技巧、获取文名和建立人际关系、获取社会资源等种种复杂的目的。因此，与同道好友共同游赏，是古代文人生活的重要内容，与什么人、在什么样的场合聚会，展示了怎样的作品，是表明政治立场、文化趣味、创作功底的方式，也让他们获得了精神上、社交上的满足。

在晚清上海，文人的谋生方式和生活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文化传统所积淀下来的记忆依然对他们发生着影响。对物的追求和沉迷，很容易转化成消费和享乐的欲望；对感官品鉴的推崇，也很容易投入到活动影像的视觉效果中来。此外，早期电影大部分是记录风土人情的短片，天然地带有异国情调。消费和观看电影一方面满足了追逐西来时尚的心理，另一方面也与文人的游赏传统联系起来，成为看似无功利的、超然于物质时空之外的游戏之举。

当然，上海文人看电影，和古代文人寄情山水、以文会友的游赏只存在表面上的相似，游赏山水的过程中与山水交融的、颇具诗性色彩的心灵活动，由于有了摄影机的中介已经不复存在。宗少文的“卧游”，是以回忆为基础的创造性活动，在绘制和凝神静观的过程中，以心灵为底板，赋予了自然景色浓厚的主观化的个人色彩。外国摄影师镜头中全然陌生的景观，却是出于对遥远异国的好奇和占有的欲望。观看者对于这些流变不居的画面，很多时候只能是被动的接受，却很难产生交融性的创造。但是，将看电影和古代文人的游赏活动接续起来，依然能够减轻新鲜事物所具有的接受和理解上的障碍，甚至通过文化记忆的精神内涵，赋予了电影一种诗意的色彩。这样，观看电影就不仅仅是纯粹的猎奇，也是在同道好友的集体活动中，宣告了拥抱现代技术的开放姿态。或许正如论者所言，“科技的革新并不能轻而易举地转化为美学模式以及欣赏趣味的变迁，相反，它能够暴露出科技本身所固有的矛盾性及其发展过程中的多重吸纳和调适。”^[6]当西来的现代科技和中国传统审美趣味交融之后，在上海这一特殊语境下，电影才带上了具有中国色彩的审美内涵，这也是日后民族影业生成的土壤和条件。

二、广闻见：半殖民时代的知识渴望

当时许多电影广告称，观看电影能够开阔眼界、增长见识。如同庆茶园便鼓吹电影“令人观之别开眼界”，^[7]并请求潜在的观众“欲广闻见请早临。”^[8]1901年9月，有西人在浦滩规矩堂放映电影，^①并打算在上海觅一戏园向华人放映。放映者相信，这些电影会让沪上士人“皆得眼界一恢也”。^[9]1902年，汇喇洋行购买了一批电影在张园放映，也宣称这些电影中包含了世界各地的视觉景观，哪怕“君亲至该处游历，花化须多川资，亦做照此一式望，”^[10]反而不如看电影省钱省力。

① 浦滩规矩堂即外滩30号的共济会会堂，建于1865年，1867年投入使用，1910年重新设计修建，1918年因一场大火而废弃。建筑内设有图书馆、阅览室、弹子房、餐厅、酒吧等。

之所以能够成为“广闻见”的工具，和此时电影的内容选择有很大的关系。如1902年11月汇喇洋行在张园放映的15部电影分别是：“一、地舆图大海洋楼台亭阁景致；二、中国拳匪大战大沽口；三、美国大战哑非到加；四、花旗国大战非力兵拿；五、两国洋争战（系有开枪放炮请诸君不必惊吓）；六、花旗法国大赛珍宝会；七、大英皇后崩后新皇接位各官绅商至殿朝贺；八、奇异极大马戏团；九、金陵西国大变戏法；十、北京上海地舆图；十一、各式异样跳舞；十二、外国乡人大火烧；十三、脚踏车上跳戏然武；十四、飞走火车快行轮船；十五、令人可笑”等。^[10]从片名和介绍来看，虽然只有15部短片，但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从地域上来说包括欧美、亚非，也包括中国本土；既有城市景象，也有乡村生活；从题材上来说，包括国家庆典、外交仪式、军事战争、游乐杂耍。如此包罗万象，自然会让观看者感到似乎在短短的时间里游历了全世界，不仅耳目一新，也增加了对于世界其他地方的直观感知。因此，电影以“广闻见”作为招徕观众的口号成了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直到1913年，上海还出现过所谓的“幻游火车”，在一个形似火车车厢的场所放映各国风光短片，并以“增长识见”等语招徕观众。^[11]

但是，正如商品的优越特性并不足以激起消费者的兴趣，消费者本身必须对此有强烈的需求，才有可能掏钱购买一样，电影的新奇内容，还不足以解释广闻见这一强烈需求是如何产生的。我们需要结合当时的社会思潮和文化语境，来阐明电影中的知识性内容为什么能够成为电影的吸引力因素，“广闻见”为什么能够成为当时电影广告的常见内容。

首先，“广闻见”是传统知识分子的修身要求之一，《礼记·中庸》中便有“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教诲，甚至认为“一物不知，君子之耻”。在读书之外，交友、“壮游”都是知识分子扩展眼界的重要途径。明清之后，游历四方成为士大夫推崇的一种生活方式，除了能够增长见识，还有助于“开辟心胸、陶铸性灵”，对人格修养和文学创作都有着深远的影响。^[12]从这样的角度来看，观看内容如此丰富繁杂的电影，似乎等于在极短的时间里见识了世界各地的人种、风物、习俗，大大扩展了对整个世界的认知范围和想象空间。

但在半殖民地的上海，广闻见的动机并不仅仅在于文人士大夫的自我修养，还蕴含着民族主义的焦虑。整个19世纪，欧洲各国不仅仅在政治经济生活领域已经完全不同于以往，人们的认识方式、思维框架和情感结构等精神领域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人类自身认识的渴望促使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多门新兴学科的诞生。知识的扩展和分类，现代学科制度的建立，基础教育的普及，不仅造成了知识的爆炸性增长，也促进了技术的飞速发展。

对于中国人来说，现代技术带来的后果是双重的。一方面，西方殖民者正是凭借现代技术，打破了东亚地区的传统政治秩序，让自古以来居于天下中心的中华帝国跌落到边缘；另一方面，现代技术并非秘不可宣的天赋之能，而是可以通过学习加以运用和掌握的。无论东方人还是西方人，只要掌握了现代技术，就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力量。

在这样的认识下，19世纪末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了解世界和掌握新的科学技术知识有了前所未有的渴望。尤其是甲午战争之后，原本作为中国附属的日本通过学习西方技术一举跻身强国之列，对中国知识分子和大众的舆论刺激尤其深刻。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西方的科技、文教等各方面的书籍被大量译介到中国，清政府也开始大量派遣留学生系统学习外国技术，学习西洋新知的急迫性成为大众舆论中的热点话题。

此时出现在上海娱乐场所的电影，面对的正是这种以新知达到自强目的的社会集体心态。汤姆·甘宁指出，“19世纪强化突出了‘眼睛的欲望’这种形式以及对于这种形式的商业化开发与利用。伴随着万花筒接连不断的城市风景的都市化扩张，通过视觉展览所呈现的消费社会的迅速发展，以及不断上升的殖民开拓的新种族和疆域的分类与开发，这些都极大地丰富并激增了人们对影像吸引力的向往和欲望。”^[13]电影所呈现的种种前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新奇事物，对于当时的上海观众来说，具有知识的性质，是了解西方、了解世界的其他地方的窗口。而其中不少片段，是西方摄影师拍摄的殖民地影像。看似公正而不带任何感情，但实际上，正是在冷漠而不动声色的记录中，殖民地的异质性特征

得到凸显。无论观看这些电影的中国观众是否有所觉察，他们实际上分享了西方殖民者的凝视世界的眼光，以及这种目光主导下的世界秩序。这种世界秩序或许是陌生的，但西方的强大力量赋予了它无可置疑的正当性和权威性，看电影就成为了解、认知和融入这种世界秩序的有效途径。

可以说，正是在自我修养和求取新知的双重需求的融合之下，“广闻见”成为电影吸引力的来源，也成为广告主经常用于招徕观众的口号。这一诉求不仅是此时电影消费的强力动机，也成为商务印书馆活动影戏部等电影制片部门所坚持的制片方向。

三、开民智：职业文人的启蒙理想

从19世纪末到1910年代，张园是上海最重要的政治集会场所之一，郑孝胥、严复等维新知识分子都流连于张园，并经常在此举行政治性活动。张园所发布的电影广告，很多方面也与一般的茶园有所不同，更多体现了知识阶层的趣味和需求。以1898年张园发布的一则电影广告为例，全文用四字韵语的方式对即将放映的电影进行了介绍：“电光影戏，向来勿有；人物活动，无出其右；第一盛景，英皇庆寿；法为盟主，邦交甚厚；俄皇登极，乃称元首；钦差宴会，葡萄美酒；德兵大操，武夫赳赳；火车到站，争先恐后；一派人声，轮船进口；跑马赛车，风驰电走；操演救火，七脚八手；歌舞跳戏，趣在小丑；美女澡浴，捉襟露肘；西人做亲，自成配偶；打拳弄球，精神抖擞；行人被窃，偷鸡戏狗；老翁灌园，栽花插柳。如此大观，不自消受。与人同乐，增其抱负。民智日开，富强可久。”^[14]韵语的使用，让这些电影看上去更加生动有趣。除此之外，更重要的便是以电影开启民智的抱负了。

开民智或许是晚清知识界最为重要的议题之一。从孔子开始，儒家学者一直十分注重对普通民众的教化。“有教无类”的方针，目的正在于打破世卿世禄制，向社会大众开放受教育的权利。《论语》中，孔子和冉有有过这样的对话，“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即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见《论语·子路》）也就是说，主导中国社会两千余年的儒家思想在初创时期便把大众教育视为其政治理想图景的实现方式，认为在社会经济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应该在全体国民范围内普及教育，这样才能让民众懂得礼义廉耻，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

但在晚清，“开民智”有着更为复杂的来源。19世纪末的几次中外战争，让中国知识分子意识到，各个方面，中国都与西方国家有着很大的差距。造成差距的根本原因，逐渐被一些知识分子归结到所谓的“国民性”问题上来。启迪民众、提高国民素质，被认为是缩短中国与西方差距的最有效、最根本的方式。晚清著名思想家严复首先提出“开民智”的说法，在《原强》一文中，严复认为中国战败的根本原因是“民智已下矣，民德已衰矣，民力已困矣。”民族精神的困顿造成了中国的失败，要想振兴自强，“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而三者之中，严复认为，“民智者，富强之源。”^[15]对于希望国家迅速强大起来的中国来说，开民智是最为重要、最为有效的途径。诚如论者所言，“严复‘开民智’的启蒙主义，亦深刻地影响了清末和五四两代启蒙知识分子。梁启超的‘新民’主张，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陈独秀倡言的‘新青年’和‘伦理之觉悟’，胡适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之‘中国文艺复兴’主张，无不深受严复启蒙思想的影响。”^[16]但是，“开民智”的主张并不是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而是通过大众印刷媒介的传播，被全国各地的地方官员和士绅阶层广泛接受，他们积极动用政治和经济力量创办新式学堂、报刊杂志，希望以声光化电的科学知识、启蒙以来的西方思想、与现代制度相呼应的社会理论，替代传统的四书五经，让最大多数的人群成为现代技术社会的有效率的生产者，并拥有作为现代民族国家之国民的身份认同和爱国意识。

《原强》1895年发表于天津的《直报》，1898年张园的电影广告上就出现了“开民智”这样的字眼，这样的事实令人惊讶。一方面，可见“开民智”的主张已经在短短几年之内便深入人心；另一方面也可见广告主的嗅觉灵敏，能够迅速而准确地找到时下的舆论热点，并巧妙运用这些热点，达到吸引潜在的观看者的目的。考虑到张园的主人张叔和曾经担任《新闻报》的编辑，也算是上海舆论界的前沿人物；出入张园的也有不少上海知识界的显赫人士，将最受知识分子关注的时髦新词运用于本园的电影广告也在情理之中。而且，相比其他地方在放映电影的时候，只是空泛地夸耀电影的新奇和精

彩,张园的电影广告往往会详细地列出放映的片目,让观看者不仅看到活动的画面和陌生的场景,还能够较为深入地了解电影的内容,这些内容中所蕴含的有关西方和世界的知识,通过电影被大众接受,也就达到了开民智的目的。

此时张园所放映的电影,和其他茶园戏院的电影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如果按照类型来划分的话,包括英、俄等国的皇家典礼、军队操练、市井场面及一些歌舞杂耍的记录,知识性的内容毕竟有限,也尚未具备传达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功能,以看电影达到“开民智”的目的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因此,“开民智”或许只是放映者的美好愿景,或者纯粹的噱头,而不是一个可以真正达到的目标。

不过,如果将这些广告放置于更长远的电影史脉络中,将看电影和“开民智”联系起来,对观看者如何理解和阐释电影内容起到了引导的作用,也决定了电影在上海都市文化中的结构性位置。可以说,正是因为不少后来的电影从业者从民族利益和大众启蒙的角度理解电影,他们的作品才更加具有本土关怀和文化忧思的特点,成为深具民族色彩、带着时代烙印的影像记忆。

四、结 语

总的来说,在普及之前,电影对于它的中国观众来说是一种相对陌生的事物。而且,画面的含糊性和多义性,让他们无法理解电影制作者本身的意图,只能从自己的文化经验出发,对电影中的内容进行创造性的阐释。这种阐释与制作者的原意可谓大相径庭,称得上是一种“误读”。从翻译的角度来看,这是被观看的对象向观看者的文化经验屈从的“归化”行为,观看者从电影中找到了(或者建构了)自己所期望的内容。对于电影来说,这是它为了被异国观众所接受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也是它作为一种文化工业,在上海大众文化语境中本土化的第一步。在迈出这一步的时候,就因为时代和地域的原因而被接受者视为游赏的助兴之物、开阔眼界的窗口和启蒙大众的工具。电影在中国的传播,就注定了要受到娱乐、政治和教育等几方面力量的牵扯,并在这几种力量的博弈中,获得自己独特的形态和语言。

参考文献:

- [1] 绘声绘影 [N]. 申报, 1898-02-20 (3).
- [2] 徐园菊花会 [N]. 申报, 1900-11-15 (6).
- [3] 绘影绘声 [N]. 申报, 1898-06-18 (3).
- [4] 曹丕. 与吴质书 [EB/OL]. http://so.gushiwen.org/shangxi_18998.aspx?WebShieldDRSessionVerify=OSTVhVTGf9GxfgtVntUE.
- [5] 王鸿泰. 闲情雅致——明清间文人的生活经营与品赏文化 [J]. 故宫学术, 2004 (1): 69-97.
- [6] [美] 张真. 银幕艳史: 都市文化与上海电影 (1896-1937) [M]. 沙丹, 赵晓兰, 高丹译.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2: 16.
- [7] 请看美国新到机器电光影戏 [N]. 申报, 1897-10-05 (8).
- [8] 同庆茶园请看美国新到超等格致化学师精制两种留声机器电光影戏 [N]. 申报, 1898-02-18 (5).
- [9] 影戏大观 [N]. 申报, 1901-09-17 (3).
- [10] 西哑办欲司拷浦 [N]. 申报, 1902-11-29 (8).
- [11] 幻游火车美国新到特别奇观 [N]. 申报, 1913-11-30 (9).
- [12] 巫仁恕. 晚明的旅游风气与士大夫心态——以江南为讨论中心 [A]. 熊月之, 熊秉真. 明清以来江南社会与文化论集 [C].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4: 225-255.
- [13] [美] 汤姆·甘宁. 现代性与电影: 一种震惊与循流的文化 [J]. 刘宇清译. 电影艺术, 2010 (2): 101-108.
- [14] 新到机器大影戏 [N]. 游戏报, 1898-04-14.
- [15] 严复. 原强 [A]. 胡伟希. 论世变之亟——严复集 [C].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4: 18.
- [16] 高力克. 陶铸国民: 严复与中国启蒙运动——纪念严复诞辰 160 周年 [J]. 学术月刊, 2014 (12): 154-161.